

楚王刘英与中国早期佛教

◎ 于怀瑾

内容提要: 东汉初年的楚王刘英是中国史载最早的佛教信徒，他在特殊的时代、地区和历史背景下，完成了中国佛教发轫的伟业，对中国早期佛教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于作为皇室贵胄的刘英从事佛教活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所兴建的“浮屠之仁祠”乃至阿育王寺当为中国最早的僧舍寺院，在中国佛教史和佛教建筑史上也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关键词: 刘英 阿育王寺 佛教

作者简介: 于怀瑾，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关于刘英与中国早期佛教的关系，很少有学者予以关注，即使偶有涉及，也只是浅尝辄止、语焉不详。刘英是史载最早信奉佛教的东汉皇室贵族，他兴建浮屠仁祠，相传曾建阿育王寺，此寺遗踪何在，已成千古之谜。作为皇室贵胄的刘英为何会崇信佛教呢？其宗教活动和所建佛寺规模如何？其狱案牵连人数众多，是否与他崇佛有关呢？这些在中国佛教史上意义重大的问题，都颇值得全面展开探讨。

一、刘英建阿育王寺之谜

今存徐州方志中，最早提到阿育王寺的是同治十三年（1874）修《徐州府志》，该书卷十八只提到寥寥数语：“阿育王寺，《水经注》：或言楚王英所造。今废。”^① 此说源自郦道元《水经注·获水》：“获水自净净沟东迳阿育王寺北，或言楚王英所造，非所详也。盖遵育王之遗法，因以名焉。”^②

郦道元幼随其父郦范“临抚东秦，道光海岱”^③，北魏孝昌初年（525）又奉诏“持节，兼侍中、摄行台尚书，节度诸军”^④，到彭城一带镇压叛乱的徐州刺史元法僧，多有斩获。他宦游淮海，对彭城周边的地理人文、历史掌故比较熟悉。由《水经注》所载可知：他经过彭城时，此地确有阿育王寺在。北齐文宣帝天保二年（551），魏收奉诏修《魏书》，其《释老志》称：“今洛阳、彭城、姑臧、临淄皆有阿育王寺”^⑤。魏收去世八年隋立，故彭城阿育王寺可能至隋唐仍在。李映辉据文献统计，唐前期徐州有著名寺庙四座，在各地排名中并不算少。^⑥ 虽不知其中是否包括阿育王寺，但即使它破败荒落，难以被历史文献提及，却未必不存在。

据《法苑珠林》卷三十八《西晋会稽鄞县塔》条载：阿育王一日夜于天下造佛骨宝塔八万四千，“晋沙门竺惠达云：东方两塔，一在于此，一在彭城。今秣陵长干又是其一，则有

① 赵明奇主编：《徐州古方志丛书》，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009页。

② 王国维校，袁英光、刘寅生整理标点：《水经注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9页。

③ 《魏书》卷四十二《郦范传》，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051页。

④ 《北史》卷二十七《郦道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95页。

⑤ 《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第3290页。

⑥ 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三矣。”^① 惠达俗名刘萨诃（《南史》作“何”），西晋泰康二年（281）病逝复苏后，发愿出家，巡游各地，礼忏阿育王所造佛塔。据《南史》记载，惠达在丹阳登越城四望，见长千里有异气，果然找到阿育王塔处所，掘地丈深，觅得铁、银、金三套函所“盛三舍利及发爪各一枚，发长数尺”，于是建塔一层藏之，后又经晋武帝和沙门僧尚改造增建。^② 剔除神话传说的叙述元素，惠达在彭城礼忏的阿育王塔也应是类似的佛教建筑，可能是阿育王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刘英和阿育王寺的历史真相已成千载难解之谜。

二、浮屠之仁祠与阿育王寺

刘英在建武十五年（39）封为楚公，十七年（41）进爵楚王，二十八年（52）始就国。到永平十三年（70）遭人告发谋反被废徙丹阳泾县，总共在彭城生活了十八年。其间，他在彭城一带弘扬佛法，留下创建阿育王寺的传说。《后汉书·楚王英传》称：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因以班示诸国中傅。英后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行符瑞。^③

“伊蒲塞”，梵文 *upāsaka*，原意为“坐近旁者”，故又译“近事男”，引申为佛教信徒；“桑门”，梵文 *śramaṇa*，原意为“苦行者，修道人”，佛教中指出家的僧人。这是正史中最早记载王室贵族崇信佛教的史料，楚王刘英也是国人信奉佛教而见诸可靠记载的第一人。当明帝开始关注西来佛教时，楚王刘英的佛事活动早已颇具规模，影响甚广，所以《后汉书·西域传》有云：“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④ 《资治通鉴》卷四十五也早有定论：“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象，而王公贵人独楚王最先好之。”^⑤

何谓“浮屠之仁祠”？《三国志·刘繇传》称：笮融，丹阳（今当涂东北丹阳镇）人。公元193年，笮融聚众数百人投靠老乡徐州刺史陶谦，被任命督理广陵、彭城漕运，放纵擅杀，贪占连同下邳共三郡的委输之资。“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⑥ 而《后汉书·陶谦传》叙其事则说：“初，同郡人笮融……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⑦ 范晔在此已将“浮图祠”径改称“浮屠寺”，可见刘英所尚的“浮屠之仁祠”即佛教寺院。如果把“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仅仅理解为推崇佛教的斋戒仪式，那么明帝诏所谓“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便无所着落了。既然明帝已明确指出刘英“尚浮屠之仁祠”，可知他当时确实在彭城建造了许多供养“伊蒲塞”“桑门”的寺院。《水经注》所言相传阿育王寺为楚王刘英所建，断非空穴来风。

①（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09—1210页。

②《南史》卷七十八《海南诸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54—1955页。

③《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28—1429页。

④《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2922页。

⑤《资治通鉴》卷四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303页。

⑥《三国志》卷四十九《刘繇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85页。

⑦《后汉书》卷七十三《陶谦传》，第2368页。

关于阿育王寺的规模格局，肯定与刘英的财力有极大关系。《后汉书》说：刘英“母许氏无宠，故英国最贫小。建武三十年，以临淮之取虑、须昌二县益楚国”。^①除此之外，史籍不见刘英楚国疆域的记述。但所谓楚国最贫小，是与刘秀另九子封国相较而言。刘英自杀国除。章帝崩，刘恭奉“遗诏徙封彭城王，食楚郡”，^②《后汉书·郡国志三·彭城国》云：“高祖置为楚，章帝改，洛阳东千二百二十里。八城，户八万六千一百七十，口四十九万三千二十七。”八城乃彭城、武原、傅阳、吕、留、梧、留丘、广戚。^③此即楚郡疆域。再加上原先光武帝为刘英增益的取虑、须昌，楚国所属应是十城，人口近六十万。疆域范围：西北接沛县城，东南包括睢宁，西南靠近淮北、宿州，东北到武原山下，西邻萧县，东临邳州。^④据《汉书·地理志》说，西汉时楚国户十一万四千七百三十八，人口四十九万七千八百四。而楚都彭城就拥有四万一百九十六户，占全楚国总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一强，仅次于长安、洛阳等大都邑。甚至在东汉末战乱中，“是时徐方百姓殷盛，谷食甚丰，流民多归之”^⑤。可见刘英的楚国彭城不仅是战略要地，也是经济比较发达、实力相当可观的地区。所以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认为东汉时彭城是重要的商业中心，繁荣富庶。^⑥与刘英相隔仅百余年的笮融在战乱中搜刮贪占三郡委输之资，也未必会比刘英的财力更雄厚。因此从笮融所建佛寺，我们不难想象，刘英所建寺院的规模格局应不输于笮融。吕澂认为，明帝感梦求法事皆由刘英崇佛虚构而来，却暗示“首先传来中国的不是佛经，而是佛像，所谓‘金人’，指的就是佛像。”^⑦按前引《资治通鉴》楚王最先“传其术，图其形象”之说，其所建浮屠祠中亦应有依图塑造的金铜佛像。而为刘英传入佛教图像的也只能是被他供养的来汉胡僧。

史述笮融兴建的佛教建筑说明，至东汉末江淮一带的佛教事业仍非常繁荣兴盛。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五载长安叡法师《喻疑》说：“汉末魏初，广陵、彭城二相出家，并能任持大照，寻味之贤，始有讲次。”^⑧可见东汉末达官显贵崇信佛教风气之盛，且须具备相当学识素养的高僧，才有资格宣讲佛法。刘英崇佛流风余韵影响深远，可见一斑。徐州旧称有七十二庵八大寺，足证其地崇佛传统之久远及繁盛。可断言，古彭城是中国佛教重要发祥地之一。

三、刘英崇佛与汉代的中印文化交流

身处江淮重镇彭城的刘英，为何会成为史载东汉王室贵族崇信佛教的第一人呢？这应与他所处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密不可分。2009年初，江苏盱眙大云山惊现西汉江都王刘非墓。刘非是景帝与程姬所生第三子，吴楚七国乱起，刘非年十五，主动请缨平叛，功成封江都王，在位27年，卒于元朔元年（前128）。这时武帝所派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张骞尚未还朝。但刘非墓出土的文物中，却有一组鎏金大象和驯象人、鎏金犀牛和驯犀人，以及骆驼形编钟底座。象、犀形似逼真，犀牛明显属苏门答腊种的亚洲犀，而骆驼形编钟底座则外形似

① 《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第1428页。

② 《后汉书》卷五十《孝明八王列传》，第1670页。

③ 《后汉书》志第二十一《郡国志三》，第3460页。

④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上海：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0页。

⑤ 《后汉书》卷七十三《陶谦传》，第2367页。

⑥ [英]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94—795页。

⑦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页。

⑧（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4页。

马。这说明江都国工匠见到过犀牛大象，却未见过真正的骆驼，只能据传闻塑造。这些现象透露出东西方交通的重要信息：早在张骞开通西域之前，海上丝路的影响极有可能已经波及江淮地区。冯承钧曾推测：中印“两地交通为时必更古也。当时通道有二，一为西域道，一为南海道，南海道之开辟或在西域道之先”。^① 刘非墓的出土文物资料足以证明冯承钧所言非虚。

据《汉书·两粤传》，自汉高祖时期南粤即与汉王朝频繁交往，吕后曾一度阻绝“金铁田器”等贸易，文帝赐赵佗书招抚，佗即去帝号，贡献白璧、翠鸟、犀角紫贝等珍奇。而《汉书·地理志》记载武帝时，由广东徐闻、合浦出海，航行数月可达谶离、夫甘都卢、黄支等古印度境内诸国。黄支即《大唐西域记》所载印度东南部达罗毗荼国的都城建志补罗城。^② 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齎黄金杂繒而往……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③ 这些说明，广东自西汉初已成为中印交通贸易的重要枢纽。不过佛教借由中印海上交往可能带来的影响，却因“其时粤人太蒙昧，未能任此高尚教理之媒介”^④ 而无从扩展。南粤相吕嘉作乱，汉武帝令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南粤平定后，东粤举国迁徙至江淮地区。其后东粤江淮之间交通往来甚盛。^⑤ 此外，江淮地区的彭城西北与山东南部琅琊相连，东南与吴郡、会稽相连，这些都是海上贸易中心，并经由番禺与印度和马来亚的贸易港连接。^⑥ 所以从海路移植来的佛教，有条件很快传播到江淮楚乡，并扎根扩散开来。而从地方思想熏染的角度来看，自先秦起，我国的学术思想就明显分成南北两大系统。北方以孔墨为代表，比较重视现实和实行；南方以老庄、屈原为代表，崇尚谈玄论道。江淮之地属于南方地区，其学风与中原对峙，由来已久。所以在全国各地间相较而言，江淮人对于佛教的理论说教更易于了解、接受。^⑦ 据《后汉书·楚王英传》，刘英也确实是在来到彭城之后接受黄老，并在此基础上顺理成章崇信佛教，大规模弘扬佛教文化，甚至建造阿育王寺的。

其实早在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代，印度佛教已经开始向本土之外传播。他进行第三次佛教结集后，就派遣上座到四方传法。在阿育王后期，佛教不仅遍布全印度，而且西及地中海东岸，北到克什米尔，南达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经过阿育王的努力和此后数百年的影响，中国江淮地区的王室贵族应该已从海路接受古印度文化的影响。阿育王的名声在江淮大地上一定非常响亮，这也许就是刘英以“阿育王”之名建寺的缘起。这样，我们便很容易理解，距离洛阳白马寺那么遥远的连云港孔望山下，为何会有一座东汉时代的石雕大象在那里踞守两千年，并且留下那么多磨崖石刻的佛像群。

四、阿育王寺遗址的位置

酈道元所见过的彭城阿育王寺，虽是相传为楚王刘英所建，但是相对于他建的“浮屠之仁祠”，却不妨视之为一个符号或标志。退一步说，即使仅仅把阿育王寺作为中国早期的佛寺

① 冯承钧撰：《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7页。

② (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54页注2。

③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71页。

④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⑤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3860—3863页。

⑥ [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裴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⑦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第26页。

建筑, 探寻其遗踪仍非毫无意义。《水经注·获水》云:

获水自净净沟东迳阿育王寺北, 或言楚王英所造, 非所详也。盖遵育王之遗法, 因以名焉。与安陂水合, 水上承安陂余波, 北迳阿育王寺侧。水上有梁, 谓之悬注桥……获水于彭城西南回而北流, 迳彭城。^①

获(汴)水由净净沟水注入处再向东, 获水流经阿育王寺北, 与向北流的安陂水合流。我们只要能够找准净净沟(白沟)水入获水处和安陂水与获水合流处, 就基本可以确定阿育王寺的位置了。

尽管历史上行政区划和地名、河道等屡有变迁, 但是山的位置不会移动, 河道的大致走向也往往会留下遗痕。明代嘉靖修《徐州志·州境之图》城西部分, 还绘有获(汴)水流过楚王山之后流向东南方向, 然后再转折向北的河道, 与酈道元所述获水曾流经彭城西南的走向大致相合。但万历年间修撰的《徐州志》州境图城西部分, 获水先南流再向北折回的痕迹便全然消失, 只留下今天的黄河故道。

经过实地考察, 我们发现, 《水经注》所说的净净沟(白沟)水, 即由今淮北市东北梧桐陂近旁的梧桐花园小区流过, 穿过楚王山东田巷村向北流去再向东拐的那条河道。此河在今徐州技师学院西不足一公里处、群英村北, 汇入黄河故道, 即汴水, 亦称古获水。但据《水经注》及嘉靖修《徐州志》地图, 当年的净净沟入汴处, 大概只能在今天的田巷村向东北一点。明正统《彭城志》卷一《乡村》载:“四乡, 古名延寿, 去城之西。凡十二村, 今为十六里。”^② 其十二村中有名清水沟村者。“清水沟”之地名在顺治、康熙年间修的《徐州府志》均有保留。所谓“清水沟”, 应是昔日“白沟”或“净净沟”名称演变讹传的结果。四乡十二村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大彭镇辖区。田巷村应是当年清水沟村的故址。

由净净沟再向东, 至安陂沟入汴处, 即阿育王寺遗址之所在地。后世的徐州地方志里早已不见安陂沟之名, 但嘉靖本《徐州志》卷四《山川》云:汴河“至州城西九里受响水沟水(有金家桥, 徐州卫指挥金聚建, 又有太平桥), 二里受早陂沟水(并由南岸入。景泰间, 徐州卫人谭敬兄弟建石桥其上, 名大安桥, 大学士淳安、商辂为记), 自城西汇於东北, 合泗水南下”。^③ 康熙六十一年修《徐州志》卷四、清乾隆修《铜山县志》卷一、道光修《铜山县志》卷二均传承其说, 记载早陂沟在城西二里。

从嘉靖《徐州府志》的地图可以看到, 徐州城西确实有一段由南护城河(即今天的奎河)流过来向北拐的河段, 标明河上还架有一座大安桥。显然, 这就是早陂沟。不过, 而今它已改称奎河。沿奎河向其上游寻访, 在安徽省宿州市今栏杆镇西南约2.5公里有安北村, 位于奎河西岸。安北村仍保留着“安陂”的读音。安、早叠韵, 故讹作“早陂”。“安陂水”或“安北沟”乃至“早陂沟”之得名应缘于读音之讹误谬传。

清代一里路, 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测定, 大约是576米。从徐州城老西门(通汴门)所在处, 即今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西门北侧向西大约1200米, 即将至段庄西头。今矿山路徐州出入境管理处东侧向南,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残留着一段南北走向的河道, 河面宽10余米。河道向北被故黄河大堤阻断, 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形成大片水塘, 村中妇女常来此洗衣。这段河道应当就是早(安)陂沟与响水沟合并之后入汴河口残存的遗痕。阿育王寺遗址应该

① 王国维校, 袁英光、刘寅生整理标点:《水经注校》, 第759—760页。

② 赵明奇主编:《徐州古方志丛书》, 第19—20页。

③ 赵明奇主编:《徐州古方志丛书》, 第257页。

就在由此向西一带地方。无独有偶，清末著名历史地理学者杨守敬等编绘《水经注图·泗水图》所标注的阿育王寺的位置，竟与我们的分析判断完全一致。^①

五、刘英是否因崇佛获罪？

周叔迦先生在述及楚王刘英大狱时说，楚王英宣传佛教而交通了不少豪杰，刺激了明帝，终于永平十三年（70）冬，明帝对楚王英兴起了大狱。^②将刘英狱案归因于崇佛，并非始自周氏。同治三年（1864）刊《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二十即径称“楚王英亦以酷信浮屠获罪”，学界多有信之者。至于“交通豪杰”，依《刘英传》所说，“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则与他后来崇佛全无关系。

刘英谋反案发，其本传称：“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③甚至牵连宗室列侯及功臣后裔封侯者十余人。其影响至深至广，民间因此不敢谈佛，也完全可以理解，但却很难归咎于刘英崇佛。

刘英入缧赎罪时，明帝已经明确表示崇佛无罪而予以宽宥，岂可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其实，刘英获罪另有更深远的历史积淀、地缘关系、时代因素和社会背景。

汉初以来，西楚彭城就动荡频仍。这里虽是高祖龙腾发迹之地，也是楚汉争战、汉军惨败之处。后楚王韩信谋反被诛，楚王刘戊发动七国之乱，宣帝时楚王刘延寿勾结广陵王刘胥被告发治罪；西汉末，刘永占据楚郡在内的东部二十八城自称天子，与刘秀争帝；直至建武十六年秋，楚地大姓还曾武力反抗度田。因此汉廷一直把楚地视为政治敏感地区。虽说朝廷对藩王一直心存戒备，并非仅仅盯着楚国，但楚国尤其值得关注。

周末以来养宾客、交游侠之风相沿成习，至东汉未衰。《后汉书·第五种传》和《马援传》都记载过达官显贵借侠客清除政治对手的实例。所以侠客以武犯禁，一直是朝廷的心腹大患。刘英虽然地位孤弱，却非平庸之辈，“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说明他一直努力谋求扩张势力。《后汉书·刘辅传》说：“时禁纲尚阔，诸王皆在京师，竞修名誉，争礼四方宾客。”^④至于其政治目的，《史记·春申君列传》有云：“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⑤故沛献王刘辅（郭后之子）纵容刘鲤结交侠客仇杀刘恭之后，刘秀更加意识到诸藩王结交侠客发展势力的政治危险性，立即采取措施，在建武二十八年（52）“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因诏郡县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⑥随即又令刘英和郭皇后四子就国。永平时，政策大变，明帝对诸侯王监控更严。而刘英自知“交通宾客”触犯朝廷大忌，却仍不收敛，“喜黄老”，“学浮屠”，召聚人众。故永平八年（65）他才会敏感地以为“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缧赎”是为他而发，遂主动入缧赎罪。所谓“托在蕃辅，过恶累积”云云，即指“交通宾客”而言。

刘英得到宽免之后，不仅毫不收敛，反倒变本加厉，更加肆无忌惮。“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招聚奸猾，造作图讖，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⑦。又《后汉书·天文中》载：（十三年）“其十二月，楚王英与颜忠等造作妖[书]谋反，事觉，

①（清）杨守敬等编绘：《水经注图》，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95页。

② 周叔迦：《周叔迦佛学论集》，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113页。

③ 《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第1430页。

④ 《后汉书》卷四十二《刘辅传》，第1427页。

⑤ 《史记》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第2395页。

⑥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80页。

⑦ 《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第1429页。

英自杀，忠等皆伏诛。”^①《后汉书·独行列传》亦云：“是时楚王英谋反，阴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觉，宪宗得其录，有尹兴名。”^②

归纳而言，刘英罪状大约有三：一、交通方士、侠客、善士，有严密组织，并登录在册。无论光武帝还是明帝，都把结交侠客视为严重危险的不轨行为。而据《后汉书·独行列传》，尹兴、陆续等受刘英牵连的人都不过是施粥放粮的良善之辈，故所谓“善士”亦非佛教信众^③；二、伪造符瑞、图书、图讖，制造谋反舆论；三、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这些均与崇佛无关。

《出三藏记集》卷七《般舟三昧经记》载：“又言，建安（十）三年，岁在戊子，八月八日于许昌寺校定。”^④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推测：此寺用刘英舅子龙舒侯许昌的名字命名，应是公元一世纪许昌后人所建，为了在楚国被废、刘英自杀后，安顿那些来自彭城的僧侣。^⑤戴密微和许理和（Erik Zürcher）均曾引用其说。许理和认为“马伯乐的解解释简单而令人信服”^⑥。另外，彭城阿育王寺、阿育王塔得以流传后世，也可见刘英死后，佛教的传播和影响并未在民间断绝。否则，古寺古塔八十年无人照管早就化作废墟瓦砾了。

楚王刘英在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地区、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了中国佛教发轫的伟业，对中国佛教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兴建的浮屠之仁祠乃至阿育王寺，在中国佛教史和佛教建筑史上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也许他当初确实是怀着叵测的政治野心召集信众、弘扬佛法的，甚至可能是假借佛教的宗教形式来组织他的政治力量。但是他在客观上的贡献却远远超出了他的主观意愿。从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献史料，我们还无法相信刘英因崇佛而获罪，不过是尽可能客观如实地还原出历史真相而已。

（责任编辑 周广荣）

① 《后汉书》志第十一《天文中》，第 3230 页。

② 《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第 2682 页。

③ 参见《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第 2682—2683 页。

④ （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第 268 页。

⑤ [法]马伯乐：《马伯乐汉学论著选译》，佘晓笛、盛丰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 266—267 页。

⑥ [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裴勇等译，第 83 页注 57。